

遠望集

上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華誕四十周年紀念文集



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

遠望集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華誕四十周年紀念文集 —

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



(陕)新登字003号

远 望 集

—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宏源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56.5 印张 1339.73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7-5368-1139-X/J·962

00380

前 言

韩 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

当二十世纪正以巨人般的步伐作最后冲刺，人们即将敲响二十一世纪钟声的伟大时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迎来了她的不惑之年。回顾四十年来陕西考古工作所取得的骄人成绩，我们感到欣慰和自豪！但与此同时，摆在我们面前更重要的也是我们最关心和必须思考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陕西考古工作。值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庆典之际，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论文集，有同志主张用“远望集”作为书名，我觉得是合适的，因为它既反映了目前考古界朋友面对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心声，也表达了我所全体同志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追求。

陕西地处长江与长城、中原与西北的枢纽地带，同时又是欧亚大陆草原文化东进南下的重要通道。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她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成为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最终在这里实现了周乃至秦的统一，以至于汉唐两个中国历史上最为兴盛的王朝也选此地建都。长期的历史积淀，给陕西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因此，这块地方也一直倍受史学界及考古界关注。

陕西境内的考古工作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期，早在1906-1910年间，日本人足立喜六即对西安秦汉隋唐城址和皇帝陵进行过调查；1914年，法国人色伽兰（V·Seglrm）对陕西等地的古建筑及崖墓进行过调查；1923年，对中国考古界最有影响考古学家、瑞典人安特生（J·G·Andensson）调查了西安附近的古遗址；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于1924年来西安讲学，当时他也曾计划“去陕西做点考古调查工作”，后因“河南和陕西遍地不靖”而未能成行。

进入本世纪三十年代，由于殷墟发掘中后岗三叠层的发现，动摇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人们开始普遍接受“夷夏东西说”，并多将夏周看成一系。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存亡日益危机，知识界更加重视对民族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夏、周、秦三族的起源与关系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的北平研究院于1933年派徐炳昶、常惠到陕西从事周秦二族史迹的调查，苏秉琦最终选定宝鸡斗鸡台作进一步的发掘，这是陕西境内现代田野考古工作的开端。陕西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她从此以后便成为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论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陕西作为西北经济建设的重点，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也如同当时的经济建设一样，雨后春笋般地迅猛发展起来，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考古训练班等先后往陕西派遣考古队站，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和实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便在这种一种形势下，于1958年应运而生了。

四十年来，我所的科研队伍不断壮大，学术研究水平逐年提高，目前正呈现出一派充满生机、欣欣向荣的景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已发现旧石器时代至历史时期各类古代遗存、遗址、古墓葬数以百计，出土文物数以万件。在加强田野考古工作的同时，我们一直注意资料的研究与出版工作，累计出版的考古报告与专著达18部，论文集27部，发表学术论

文与考古简报600余篇，我所的杂志《考古与文物》出版110期。大量考古资料与研究成果的发表，提出并解决了不少重要学术问题，推动了陕西考古工作的发展，其中一些工作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陕西区域考古的范围，为全国乃至世界所瞩目。

陕西史前文化遗存十分丰富，经我所考古工作者及陕西省同行们多年的努力，不论是旧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为陕西古代史特别是古史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我所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与研究起步虽晚，但成绩却很显著。八十年代初，在对梁山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中，发现其石器中既有“泾河—丁村系”的特征，又有华南一些文化的特征，梁山文化这种南北混合的特点，使人们第一次对地处南北自然地理交汇地带的远古文化有了认识。大荔人是我中国人化石中保存最完好的头骨化石之一，发现于1978年，据研究其特征与北京猿人接近，基本上介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属于早期智人的古老类型。铀系法测年约在距今18—23万年间，应属中更新世晚期。1986—1987年，我所在大荔人化石点进行了大量考古工作，获取了大批以小型石片器为主的实物资料，将这一研究引向深入。大荔人文化，在时间上填补了我国更新世旧石器文化的空白，空间上又是东西小石器文化的中间地带，对研究小石器文化有重要意义，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乃至东亚古人类研究的空白。

1995—1997年，我所与商洛地区文管会组成考古队，在陕西东南秦岭山区的洛南盆地旧石器地点和龙牙洞遗址进行的调查和发掘，这是我所单独从事旧石器考古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共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地点43处，石制品35000余件，遗址中无论是石器，还是动物化石，都有明显的南、北特征，是又一处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交汇点，这项成果填补了秦岭山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此项发现已荣登《中国文物报》199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列。

陕西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成绩尤为突出，目前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考古文化发展序列，为周边地区的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比较可靠的参照体系。1959—1963年，我们对渭水、泾水、汉水、嘉陵江上游、无定河、洛河、延河等陕西主要河流两岸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调查与试掘，为全面了解陕西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提供了线索；1960—1961年，我所对李家村遗址的两次发掘，得到了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高度评价；进入80年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组建的汉水、安康两个考古发掘队又先后在何家湾、龙岗寺、白马石、马家营、阮家坝等遗址发现了“李家村类型”遗址文化遗存，马家营遗址还第一次发现这类遗存的彩陶，阮家坝遗址发现了这类遗存的早晚地层依据，龙岗寺发现了它的最晚期单位。这些发现使李家村类型遗存的研究走向深入，为探索汉水上游仰韶文化的渊源提供了宝贵线索。1995—1996年，在配合临渭高速公路建筑中发现的“零口遗存”更加推进了陕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研究，引起了专家普遍关注。该遗存以环形口小平底瓶、直口假圈足钵、敛口深腹钵等为代表，在层位上处于半坡前类型之下。目前可以确定该遗存是处于前仰韶到仰韶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遗存，它与晋西地区的同类遗存遥相呼应，为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陕西仰韶文化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经我所发掘的重要遗址就有长武下孟村、西乡何家湾、南郑龙岗寺、宝鸡福临堡、铜川瓦窑沟等，并参与或主持发掘了临潼姜寨、渭南史家、

岐山王家嘴等遗址。仰韶文化的时空构架得以确立。1997年，在配合渭潼公路建设的考古项目中，对著名的泉护村遗址进行了自五十年代以来的第二次发掘，发现了庙底沟文化成排分布的地穴，延续数百米，个别地穴底部发现有灶坑。这对于目前认识关中地区庙底沟文化聚落形态的研究输入了新的“血液”。另外，在这一遗址灰坑中还发现了碳化稻米，第一次将我国新石器时代稻米实物的发现推广到了黄河流域，这对探讨中国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龙山时代陕西诸考古文化的研究，虽没有仰韶文化研究深刻、广泛，但也揭示出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如康家遗址有规则的聚落布局和成排成列的房子，反映了当时家族生活的缩影，是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公社聚族而居到分族（家）而居的活生生的印证，对探讨国家的起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996年在配合陕京天然气管线建设的考古发掘中，在神木新华遗址发现了龙山晚期——夏代的文化遗存，其陶器特征上不仅显示出北方长城沿线的风格，还表现出了与关中、晋西等地同期遗存的关系，为陕西特别是陕北晋西地区龙山晚期及夏商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进入夏商周时代，陕西的青铜文化以其雄浑凝沉、古奥神秘的风采在世界古代文明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为不断揭示其文化面貌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如前所述，陕西的考古工作是伴随着已故的苏秉琦先生在宝鸡斗鸡台发掘周代墓葬而正式开始的。建所四十年来，我们在周原、凤翔西村、长武下孟村、商洛东龙山、耀县北村、临潼西段、沔东等诸多遗址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批又一批丰富的资料。

陕西境内的夏文化遗址较少，一直是陕西考古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可喜的是，1997年在商洛东龙山发现了一处面积可达30万平方米的夏商文化遗址。经过97—98年的发掘，发现了大量的灰坑与墓葬，出土了一批陶器、石器、骨器、青铜器。其陶器面貌总体上与二里头遗址大体一致，但也呈现出一些地方特点。这一发现为研究夏文化的分布范围、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该遗址还包含有商代二里岗时期的遗存，陶器面貌与郑州二里岗遗址相同或相近。这反映出商文化占据伊洛平原后迅速西进的历史过程。与此相对应，我所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联合发掘的耀县北村商代遗址，揭示出商文化在渭河北岸的西进过程。到目前为止，已知陕西境内的商文化可以往西到达周原一线，在西安老牛坡、周至豆村、礼泉朱观咀、扶风益家堡、白家窑、岐山王家咀等地点，还发现了相当于殷墟时期的商文化遗存，其地方性特点已较二里岗时期远为明显。陕西境内商文化的分布、时代、西进与东退的过程，到目前已大体勾勒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与商文化同时并存于关中西部的乳状袋足鬲遗存是一支陕西土著文化，它向西可以达到渭水上游，在泾水流域也有广泛的分布。刘家基地的发现，对这支文化的研究曾经带来一个高涨的时期。

与此相关连的是先周文化重大课题的研究。我们所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合作在扶风益家堡、武功岸底、麟游蔡家河等地进行发掘，不断地将先周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1996年以来，我所承担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第六课题——武王伐纣年代研究，在岐山王家咀与武功郑家坡的发掘对于进一步认识先周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王家咀的发掘显示出商文化的消退、先周文化的出现与壮大过程，郑家坡的发现对这一类遗存的分期及年代研究起到了深化

的作用。发掘中采集到的一批碳十四测定样本，相信会为“断代工程”起到应有的作用。

继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在周原的发掘，不但为先周文化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也给西周文化的研究带来了珍贵资料。我所与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单位合作在周原遗址的发掘工作，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成绩，大批青铜器特别是带长篇铭文的青铜器的出土、甲骨文的发现、大型建筑基址的揭露将西周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不断地推向前进。在镐京遗址发掘的五号宫殿遗址弥补了泮宫建筑方面的不足。

在陕北地区，李家崖文化的发现为这一片黄土地的古文化增添了新的篇章。李家崖城址的发现，揭示出商代晚期到西周时代陕北古文化面貌，从而为在这里屡屡发现的青铜器找到了“主人”。这对于全面认识陕西青铜文化、研究北方文化与关中文化的交流均具有积极意义。

周王朝东迁之后，秦人入主关中，并最终统一中国建立起第一个封建制国家。与周人历史相似，秦人从一个蕞尔小邦发展成国家。研究其历史进程无疑对于研究国家起源这一重大课题能起到促进作用，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实例。然而，首要地是揭示其具体的历史进程。

春秋战国秦的考古，近20年来取得重大进展。对凤翔县的春秋秦都雍城进行了全面钻探与测绘。了解到宗庙、朝寝等大型建筑群，居于雍城中心部位。对马家庄的宗庙遗址、朝寝遗址、棉纺厂的市场遗址清理发掘，大体上知道与文献记载的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布局相近。并分别把宗庙内几个部分定名为祖庙、昭庙、穆庙、亡国之社、都宫、都宫门、考证了它们的不同功能。同时，指明朝寝建筑是周秦时代五门三朝制度的实证。

在凤翔长青乡孙家南头千河东岸还发现1处2万平方米秦代宫殿遗址，出土“蕲年宫当”、“竹泉宫当”、“橐泉宫当”、“来谷宫当”等瓦当，应是战国乃至统一秦的蕲年宫等四个宫殿所在。据研究这里可能是《史记》所指的千渭之会，所出文字瓦当全在秦代地层之内，将文字瓦当出现时间提前了。在雍水河发现栎阳宫等瓦当，在东距雍都10公里的横水凹里村，也发现秦汉宫殿遗址，出土鱼鸟、双翟纹瓦当。

在凤翔南郊的三畴原上，探明了14座秦公陵园。按照不同的隍壕可划分为3种类型：双隍型——以双马蹄形内隍围绕中字形主墓室再以中隍环围东西墓道在内的主墓、祔葬墓及车马坑；单隍型——主墓墓室之地面上无内隍，仅以中隍环围主墓和车马坑；组合型——内座陵园共用中隍或陵中套陵。

从1976年—1986年发掘了秦公一号大墓。大墓平面呈中字形，墓室东西长59.4，南北宽38.45-38.8，深24米，全长300米，面积5334平方米，是迄今为止发掘的先秦大椁土圜墓中最大的一座。木椁使用了周秦时代的黄肠题凑制度，墓室上层填土中发现人牲20具、箱狗72具、匣狗94具。墓内出土300号石磬上，有“天子酈喜，龚桓是嗣”篆文，墓内器物亦具备春秋其特征，因此推断墓主为秦景公（前577-前537年）。这是春秋秦第一座有明确墓主的陵墓，对建立考古标型学有重要意义。

在临潼芷阳韩峪乡发现了秦东陵。始建时间应从献公迁栎阳起，至庄襄王，前后相继137年。已发现亚字形墓3座，中字形墓2座，甲字形墓3座，陪葬坑3座，陪葬墓区4座，地面建筑7处。以自然沟壑为界线，个别陵园有隍壕。亚字形墓在东陵出现，把墓提高到陵的地位，具有开拓秦陵体系新阶段的意义。

秦都雍城及宗庙、朝寝、凤翔秦公陵园、临潼秦王陵园的发现或发掘，使秦国考古走在

六国考古前列。

秦汉考古始终是陕西考古研究所发掘与研究重点。秦都咸阳宫殿调查与发掘，持续了30多年，发掘了1号、2号、3号建筑遗址，发现回廊、宫殿等遗址，出土筒瓦、板瓦、瓦当、铺地砖、长方形空心砖，以及烧残的丝绸等。还发现大批壁画，内容有人物、动物、植物、建筑、神怪和边饰。色彩有红、黑、白、朱、紫红、石青、石绿等，表现了秦人独特文化面貌。

近10多年，对始皇陵的地宫进行勘探，发现了地宫周围有一道未经焙烧坯宫墙。南北长460、东西宽392米，墙体高厚各约4米，顶部距现地表2.7-4米。宫墙东边有斜坡门道5个，北边、西边各1门。宫墙内面积180320平方米。中国地质科学院物探研究所两次测试，发现始皇陵封土的中心部位有强烈的汞异常反应，面积达12000平方米，这与《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说法相符。

1979年—1982年，在封土北侧发现1座大型建筑基址，在内外城西垣之间钻出5座基址。基址内出土大量板瓦、筒瓦、陶水管、井圈、方砖、金属工具及兵器。陶器刻有“丽山食官左”、“丽邑二斗半、八厨”等陶文，这组建筑应是供奉陵寝膳食的“食官”遗址。

陪葬坑已发掘或正发掘有的3座（1、2、3号坑）：在封土西侧20米处探出铜车马坑1处，发掘出1号车（高车、戎车），2号车（安车），均为皇帝法驾卤簿内的车种，是秦始皇车马仪仗的象征。1979年—1996年在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不断发现修陵人墓地，从18件志文瓦片看，知道这些人的服役性质、爵位、姓名，表现原系从山东六国地区征调来修建始皇陵的。1996—1997年，在始皇陵正西新兴村钻探400平方米的修陵人墓地，共计200多座。

在配合公路建设的随工清理中，1995年3月9日，在秦始皇陵封土以北130米处发现和清理了一组大型建筑群，建筑面积4800平方米。遗址西端与西内城垣相连。整个建筑由6组形制不同的大型建筑构成，1号与4号是坐南朝北的廊院四合院式建筑。5号为1000平方米的大建筑。在遗址南端发现一条长50余米的片石散水。该遗址中心还发现几块彩绘俑头残片和箭头，表明陵寝建筑中可能放置武士俑。

在始皇陵园外城垣东北角以北750米处，发现一甲字形殉葬坑，面积300平方米，经大火焚烧，坑底残留不少动物残骨，有属鹤、鸡等禽类，有豕、羊、犬之畜类，有鱼、鳖水族类，因此，专家推断可能是秦始皇食品瘞埋库，这是秦代考古史上前所未有的发现。

1997年4月—6月，在始皇陵东的内外城垣之间，钻探发现面积约14000平方米的一座大型陪葬坑，平面为长方形，南北两壁均有斜坡门道，未经试掘内涵不明，但面积比1号兵马俑坑稍大，值得引起注意。

汉代考古收获主要是景帝阳陵的发掘与钻探。目前已探明景帝陵为亚字形，四条斜坡墓道两侧，各有10座从葬坑不等，现已探明陵城内有78座俑坑。景帝与王皇后同穴不同茔，各有自己陵园，又共同使用庙、寝，共同拥有大型陪葬区等等，尤其是帝陵南阙门的发掘，表明它是我国最早、级别最高的一组三出阙，为汉代帝陵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珍贵资料。

在已探明的景帝陵东南与西北方位，各有24座丛葬坑。通过试掘知道，各坑内容性质不同，有仪仗、男女骑兵、各种战车、步兵、粮食、府库等陶俑或器具，已出土4000多件彩绘俑，总计文物达40000件。

景帝陵园四周发现12处建筑遗址，总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有的遗址外有城墙，墙外有壕沟，规整宏大，保存完好，内涵丰富。2号高台建筑遗址上，有直径1.5米的罗盘石，上面有阴刻的十字经纬线，正指磁北方向，为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测量标石。

在景帝陵园的东司马门外，是阳陵的陪葬墓区，占地3.5平方公里，似应为史书上所称的“郡国”墓园。它们均以兆沟分割，每个墓园面积70米×70米、或90米×90米、或120米×120米不等，距帝陵近的为西汉早期墓，远的则可到东汉中期，兆沟总长达40多公里，墓园内已出土各类文物5000多件。

1990年曾对汉武帝茂陵从葬坑进行过试掘与钻探，发现有竖穴坑道窑洞式从葬坑。坑内或殉车马、或禽兽、或陶俑，数量达到惊人程度。

两汉墓葬集中发现在汉长安城的郊区，据统计95—98年已发掘近2000座。形制有竖穴土圜、竖穴洞室、斜坡道天井洞室、斜坡道砖室等。华阴、潼关一带的杨氏家族墓地，几乎都是砖室墓，有十字形、长方形、双室墓三种，均为夫妇合葬。西安交大壁画墓是目前所知保存最好的二十八宿天象图的西汉壁画墓。1997年我所还科学地发掘了神木大保当24座东汉中期画像石墓，发现50多块施彩画石，极为罕见。这些两汉墓葬的发掘，对了解两汉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汉代家庭结构有一定意义。

80年代前期，在华阴县发掘了建于汉武帝时期的京师仓，面积达78万平方米，发掘出仓城一座，粮仓6座，是秦汉时期最大的一处粮仓遗址。80年代后期，在位于咸阳西南郊的古河道上发现了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木构木梁桥遗址。该遗址还出土大型的金属构件，反映了秦汉时代桥梁建造的高度水平。

陕西是全国隋唐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地区之一。在西安及其附近，隋唐陵墓分布密度大，等级高，类型序列最全。因此，帝陵制度和墓葬分型分期又是陕西隋唐考古研究的重点。

孝陵位于咸阳陈马村，是北周武帝宇文邕与武德皇后合葬墓。地面无封土及建筑痕迹，为斜坡道五天井单室土洞墓。出土陵志、皇太后金玺、十三环玉带、大型玉璧等。它的发现为寻找北周其他帝陵，研究隋唐帝陵与其渊源关系，提供了有益线索。

进入90年代以来，对唐十八陵的勘测有了通盘的规划。出于保护目的，首先对乾陵地面建筑遗址进行发掘，两组三出阙的发现，可能是高宗、武则天两个朝代不同的时期建造的产物，尤其在司马道两侧大型石刻的设置，是超越献陵、昭陵制度的，也可能是武周朝的创造。这种设置大型石刻的制度对乾陵以后的唐代帝陵，乃至明清皇陵影响巨大。通过中德合作，对桥陵、泰陵等几个唐代帝陵全面测绘，而第一次准确测定了唐昭陵、建陵内各类陪冢及遗存，无疑会推动深化对唐陵建筑形制、陵寝制度的研究，为保护工作提供坚实资料。

唐僖宗靖是唐陵中第一座经过抢救性发掘的帝王陵。陵内粗劣的十二生肖壁画，用武则天朝杨再思等权要墓碑筑成的帝后棺床，简陋的土洞墓室，都给人以强烈的启示：如果政治腐败，兵连祸结，社会动荡，即便是贵为天子其下场也必然是悲惨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墓葬在陕西发现不多。三国时期以蜀墓为主，多分布于汉中地区，主要有砖室与土洞两种结构。勉县老道寺和城固宝山发掘的几座砖室墓分单室与前后室两种，器物以陂池、模型与蜀币为特色。三国时期曹魏墓仅在关中、安康有零星发现，形制与东汉相同而不易辨别。

长安县南里王村的一座斜坡道带天井洞室墓，是迄今发现的唯一有天井的西晋墓。西安

灊桥路家湾发掘了五座西晋墓，分单室、双室两种，均为斜坡道土洞墓。其中一座绘有北斗七星，并书“元康四年地下北斗”字样。

近年来发掘北朝墓30多座，分为竖穴土坑，斜坡洞室和砖室墓三类。个别土洞墓带天井或绘壁画。咸阳底张湾一带曾出土一批等级较高且有墓志的北周墓葬。华阴市杨氏墓群，汉中崔家营西魏大统十年侯义墓，商州市区北周墓等都具有家庭或地域特点。南朝墓多集中于安康地区，以中小型单室砖墓为主，砖多模印花纹或人物图案。安康长岭一座墓内出土各类乐舞俑65件，反映了西域乐舞流行情况。这些墓葬对研究北朝墓分型、分期、门伐制度、民族融合、文化交流有重要价值。

隋唐墓近年来已发掘300余座，其中隋墓近30座。有相当一批隋唐墓主清楚，纪年明确，研究工作进行得亦较充分。近年来，皇室贵戚墓有较多发掘，如惠昭太子、新城长公主、贺若氏、节愍太子、李晦、惠庄太子，以及长安南里王村韦氏家族墓等，其中石刻线画、壁画、三彩、白瓷、哀册以及陶俑，都有惊人发现。隋唐墓在300多年时间中，变化明显，且有鲜明的阶段性，故学术界对唐墓分期研究是热门课题，有三期、四期甚或七期说法。

建国以来，三次唐代金银器的重大发现，两次是在陕西。1970年10月，西安南郊何家唐代窖藏共发掘各类文物一千多件，而金银器物就达270件，其中有饮器、食器、手饰、药具、容具、炼丹器、货币，据考证，器物时代分初、盛唐两期，其下限不会晚于天宝15载（公元755年）。1987年2月至1988年6月，对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的发掘，获得了供奉四枚佛指舍利的121件（组）金银器物。除饮食器，主要有舍利供养器、法器、盥洗器、熏香器、茶具、手饰等，许多器物为首次发现，扩大了对金银器在唐代使用范围的认识；器物上的铭文，对制作年代、器名、重量、制作官署、职官都有明确记载，拓展了对金银器研究的内容。尤其是首次阐明45尊造像宝函为金刚界大曼荼罗成身会之图像，揭开了失传千年的唐密教之谜，在唐密研究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地宫中还出土大量丝绸衣物、琉璃器、秘色瓷，因此，被评为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10次最重大发现之一。另外，对白水宋妙觉寺舍利塔基的清理，获得八棱金塔、银函及尊胜陀罗尼经幢，揭示了宋代密教流行状况。对周至仙游寺法王塔进行了拆除、搬迁，证实该塔应为唐代所建。

陕西是我国石窟艺术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尤其以晚期石窟的大量遗存著称于世。目前共发现北魏到明清各代石窟350余处。北朝重要石窟有9处，隋唐五代有32处，宋金元有73处。陕西石窟特点是大型窟少，小型窟多；群体窟少，单体窟多；大体量造像少，小体量造像多；北朝隋唐石窟少，宋代较多；长期连续造凿的少，时代单一的窟多；关中及关中以南的少，陕北窟多；组合复杂的少，题材简单的多。近年来，我所对陕西境内重要石窟都作过调查。中德专家合作还对麟游慈善寺进行了详尽的测绘。陕北宋金时代石窟，是在两京地区石窟艺术衰落时，造像重心转而南下北上的结果。正是在造像艺术北上时，找到了陕北这块政治、军事、文化及自然环境均具充分凿窟造像条件的沃土，形成了宋金石窟的兴起与繁盛。这里是四川大足石窟以外，中国晚期石窟艺术得到充分发育并集大成之所在，是一座潜力很大的艺术宝库，在中国石窟艺术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地位。

我所对北方地区烧制陶瓷品种最为丰富的综合性窑场——铜川耀州窑进行了长期发掘。发掘面积之大，学术收获之巨，为目前国内瓷窑考古所仅见。清理出一大批唐、五代、宋、元等时代的制瓷作坊、试釉小炉、窑炉、石灰窑、贮藏洞、原料加工场、堆料场、晾坯场等

遗址、出土大批瓷片及各种制瓷工具和窑具。发掘表明，唐代黄堡窑已能生产十几种高温釉瓷、唐三彩和低温釉单彩陶器，种类丰富，装饰技巧和手法多样，在当时国内唐代窑场中十分少见的。宋代耀窑达到鼎盛期，烧制“官”字款瓷，说明耀州窑地位空前提高。元代白地黑花瓷得到迅速发展。研究耀瓷演化脉络，极大丰富和深化对中国古代陶瓷的认识。

1993年我所还对著名的隋唐灊桥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并获得当年十大发现的殊荣。对华阴西岳庙的发掘，给我们了解中国传统信仰体系构成，有着十分积极意义。

回顾这一历程的同时，我们感到还有许许多多工作在等待着我们。

我们与在陕西工作的考古同仁一起虽然建立起一个大体上连续一贯的、自7000多年以来的文化序列，但这一系列尚不完全。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缺环、龙山时代与先周文化之间的缺环、陕北地区区系类型的不足都是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除了弥补上述缺环外，还要加强聚落方面的研究。在对具体某个遗址作尽量透彻的认识的同时，还要从客观的角度对某一区域（如某一河流沿岸）作综合考察，并进而对渭水流域作全面的分析与研究；除了研究其日常器用，还要加强对物质文化背后所包含的内容作更多的揭示——不但要知道某一文化、某一种器物的时间、空间、功用，还要加强对其中的“怎么样”与“为什么”多作研究；要加强对国外史前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介绍与学习、吸收，充分利用我所对外交流较多的长处，逐渐地将史前研究引向深入。

商周考古方面，先周文化的研究仍是一个主要课题，这不仅对于建立更加系统的关中文化序列，而且对于研究周人的历史进程乃至国家起源与演进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有所突破，在先周文化的渊源、发展壮大与其它文化的互动关系等方面有所建树；寻找周王陵是又一大课题；与此同时，还要对陕西夏商文化作进一步的研究；在陕北地区要开展更多的工作；在陕南尤其是东南部的商洛地区，试图探索楚文化的渊源。

我们虽然在秦人迁居雍城以后的文化遗存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对秦人早期如迁居“千渭之会”的遗址却所知不多，今后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秦汉与隋唐时期的考古，将继续帝王陵的研究，以汉阳陵的调查、发掘为契机，对汉皇帝陵园作较为全面的探讨。发掘汉唐墓葬数量日益增加，加强报告的编写与综合研究，力争使零散的资料获得新的意义。

在今后的工作中，仍将坚持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的原则，将配合基建与课题研究结合起来，力争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回顾过去，我们感到无愧于时代，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我们将努力跟着时代的步伐，做到无愧于时代，无愧于陕西这片考古沃土。

目 录

1、 中国氏族社会考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与方法问题·····	石兴邦	(1)
2、 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样性与融合性·····	魏京武	(27)
3、 认识系统考古单位·····	李浪林	(40)
4、 考古学解释与理解的旨趣·····	姜 捷	(47)
5、 中国稻作农业和陶器的起源·····	严文明	(49)
6、 再论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的起源·····	吴耀利	(53)
7、 黄河流域粟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	张之恒	(59)
8、 中国原始稻作农业三种主要发展模式研究·····	裴安平	(67)
9、 仰韶文化绝对年代研究检视·····	王仁湘	(83)
10、 试论汉水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杨亚长	(97)
11、 零口遗存初探·····	阎毓民	(113)
12、 渭水流域新石器时代环境气候演变的初步研究·····	张宏彦	(121)
13、 零口遗址孢粉组合反映的古地理环境·····	周春茂 阎毓民	(129)
14、 中国新石器时代各地区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的比例·····	袁 靖	(137)
15、 陕西史前文化的谱系研究与周文明的形成·····	张忠培 孙祖初	(145)
16、 龙山玉鸮·····	孙 机	(164)
17、 岩画的断代·····	汤惠生 高志伟 卜玉凤	(177)
18、 早商文化的考古学横向观察·····	刘 绪	(189)
19、 刘家文化来源的新线索·····	李水城	(193)
20、 刘家文化的初步研究·····	牛世山	(200)
21、 古密须国文化的初步认识·····	张天恩	(214)
22、 论碾子坡文化·····	刘军社	(221)
23、 西段遗址与古戏地、骊戎地望探讨·····	刘恒武 呼林贵	(233)
24、 夏商周三代城市聚落研究·····	徐良高	(237)
25、 先秦宫城位置变化浅析·····	李自智	(254)
26、 从考古发现谈西周封邑成周的铸铜和制陶手工业·····	张 剑	(259)

27、周代前期的周人墓地·····	孙 华	(265)
28、论泾阳高家堡周墓·····	张长寿	(290)
29、关于晋侯墓随葬器用制度的思考·····	曹 玮	(294)
30、燕侯克鬲盂考·····	刘 雨	(302)
31、房山琉璃河出土之克器与西周早期的召公家族·····	朱凤瀚	(303)
32、鲁侯爵铭文考释·····	文术发	(309)
33、莒公孙潮子钟考释与臧家庄墓年代·····	王恩田	(313)
34、西周“鬯器”读考·····	周晓陆	(319)
35、保卣之我见·····	秦建明	(323)
36、“铸师”考·····	赵 超	(329)
37、陕西周原甲骨刻辞中的“太保”·····	汪 涛	(335)
38、“南龟北骨”说的再认识·····	李 零	(338)
39、也谈周公未曾称王·····	王占奎	(346)
40、周人传子制非“周公手定”·····	杨升南	(353)
41、周厉王在位年数考·····	张懋镛	(357)
42、“懿王元年天再旦”与金文历朔互证·····	武家璧	(361)
43、我国史前及商周时代的“琮”略探·····	胡金华	(346)
44、从周原出土蚌雕人头像看塞人东进诸问题·····	水 涛	(373)
45、试论西周时期的扁茎柳叶形短剑·····	高西省	(378)
46、兽面玉雕、兽面纹、神人兽面纹·····	陈星灿	(389)
47、论甘肃礼县铜钺·····	李学勤	(396)
48、春秋青铜矛·····	李建民	(400)
49、东周楚乐初探·····	陈振裕	(407)
50、山西东周戎狄文化初探·····	陶正刚	(415)
51、秦迁置雍城的环境优势及其特征·····	田亚岐	(426)
52、鄂尔多斯猴子骑马青铜饰与《西游记》中弼马温的由来·····	王 迅	(431)
53、从考古与古文字的角度看《仪礼》的成书年代·····	王 辉	(435)
54、中国上古酒的酿制与品种·····	宋镇豪	(442)
55、浅谈明堂的起源·····	姜宝莲	(448)
56、中国的统一：一个宇宙的新图像·····	洁西卡·罗森	(453)

- 57、辽宁绥中姜女石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辛占山 华玉冰 (491)
- 58、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再认识·····赵化成 (501)
- 59、简论秦陵兵马俑产生的历史根源·····王育龙 程学华 (509)
- 60、上焦村秦墓主人疑非始皇子女说·····段清波 (515)
- 61、巴蜀墓葬某些因素之分析·····宋治民 (522)
- 62、“汉承秦制”的考古学观察与思考·····梁云 (533)
- 63、汉代城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刘庆柱 (544)
- 64、陕西汉墓形制试析·····侯宁彬 (552)
- 65、四川西汉土坑木椁墓初步研究·····何志国 (564)
- 66、上林三官铸钱官署新释·····党顺民 吴镇烽 (573)
- 67、墟落遗珍 汉室光华·····王学理 (577)
- 68、汉代陶俑浅议·····谭青枝 (585)
- 69、汉代拱桥考述·····王子今 (592)
- 70、“穆天子会见西王母”画像石之管见·····王炜林 (601)
- 71、汉茂陵“阳信家”铜器权属问题研究综述及其管见·····韩若春 (607)
- 72、论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汉代金银器·····张景明 (614)
- 73、论南越王墓出土的玉璧·····黄展岳 (625)
- 74、西安北郊枣园南岭汉墓玉器分析·····王望生 (632)
- 75、试论斗拱的起源及基本形制的确立·····焦南峰 (639)
- 76、弥生时代铁器及其制作技术研究·····王巍 (653)
- 77、安阳隋墓所见北齐邺都文物制度的影响·····苏哲 (667)
- 78、北周的甲骑具装·····杨泓 (675)
- 79、隋唐东西二京布局分析·····李永强 邢建洛 (683)
- 80、中国古代都城的历史演变与定型研究·····王维坤 (688)
- 81、现代城市中的古代城市遗痕·····徐莘芳 (695)
- 82、西安郊区凤栖原部分中小型隋唐墓葬的形制与分期·····张韵 (700)
- 83、唐墓壁画中的屏风画·····张建林 (720)
- 84、唐卢之翰夫妇墓志铭考·····戴应新 (730)
- 85、唐李他仁墓志考释·····孙铁山 (736)
- 86、唐代以前的外来金银器·····齐东方 (740)

- 87、欧洲流传与收藏的辽代金银器……………韩 伟 (749)
- 88、辽宁省博物馆藏鱼龙纹铜镜及相关问题……………刘 宁 (759)
- 89、南北朝隋唐时代铜瓶“铜匙”用途辨析……………韩 钊 (768)
- 90、中国南北朝以前的佛教造像与江南地区佛教的传入……………郭丽英 (782)
- 91、麟游慈善寺石窟造像的分期与类型……………尹申平 (813)
- 92、中古时代中朝日三国佛教艺术中思维弥勒菩萨造像的起源及其演变…汪德曼施 (824)
- 93、唐长安七宝台石刻的再省思……………颜娟英 (829)
- 94、密陀僧的早期发现和应用……………王进玉 (843)
- 95、试论北方青瓷的改进和白瓷发展的分野……………秦大树 (849)
- 96、唐黄堡窑青瓷概论 —— 兼谈有关“鼎州窑”的问题……………仵录林 (857)
- 97、耀州窑出土的五代“官”字款瓷器……………杜葆仁 (862)
- 98、宋代耀瓷的生产工艺……………糕振西 (865)
- 99、试析南方的仿耀瓷器……………王小蒙 (872)
- 100、明秦王府瓷器装饰艺术初探……………宋远茹 (884)

中国氏族社会考古研究的 理论与实践与方法问题

石兴邦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50年代初,尹达同志提出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任务,是研究中国的氏族社会历史,为大家所接受,将近半个世纪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论在理论、方法或文化系统方面都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在世纪之末,需要作一回顾和概括。在这里,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论述。

第一、将近半个世纪来,新中国考古研究工作的简单回顾

自从以田野考古为园地,以物质文化遗存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俗称锄头考古学)诞生后,在世界范围内的古代史研究的科学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掀起了一场意义深刻而影响深远的革命。因为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大大拓展了历史科学的广延范围,延伸了不止数千百倍的人类活动的时代跨度,层层不断地揭示出沉积在地下文化层中的历史文化蕴蓄。从东亚到西亚,从北非到欧陆,从旧大陆到新大陆,以及人类活动过的海洋岛屿,逐步地解开了一个个历史之谜,一座座、一片片旷世伟迹及文化珍宝显露于世,显现出人类不可思议的伟大创造力和思维世界的奇迹,这些发现,不断地充实着历史的内涵,改变着历史面貌,多多少少改变和指导人类历史发展前进的理论导向。

从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中,给我们提供了宏阔的历史视野,使我们能够了望到洪荒远古的史前时代,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年前人类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和景象,重现出消失在荒古时代的历史画面、农业革命的发展过程和文明产生时代的历史图景。许多在人们记忆中那些模糊而又具体的历史传统和神话传奇,在考古家的锄头下,显映出具有真实的历史素地。缺失的得到补充,错误的得到了纠正,从而恢复了历史真迹。

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范围及层面,也在日新月异地进步、扩展和深入,人类历史的轮廓和面貌也在显露其清晰、全面和真实。特别是在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探索中,不断地扩展、宏富着历史画卷。因为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能在较深的层次和较广阔的范围,入微地探索与考古学文化相联系的有关问题,对考古发现的各种标本(文化的或自然的)进行多学科鉴定、分析和研究,其取得的成果,不断地丰富、充实考古学研究的内涵,拓展研究方法和范围。从人类文化的史证,到与文化相联系的生态环境、动物群体及生化系统的各个方面。从理论到实践,都为考古学的整体发展、全面的恢复古代历史提供了新的领域,能使人类文化面貌更全面、更充分地显现在我们的面前,达到文化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历史与逻辑的发展整合。

所以,现在各国,特别古代文明国家和现代技术发达的国家,相当广泛地利用考古学方法和手段,研究解决古代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甚至涉及到自然史方面的问题。

现代考古学是本世纪30年代才引进中国的,我们的先辈,做了不少开拓和奠基性的工

作，也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涉及到中国古史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但由于时间短，底子薄，只是揭开了中国古史的部分层面，不论在材料的积累方面还是问题发掘的深广度方面，都有很大的局限。

在本世纪的50年代，在血和铁的百年洗炼中，复苏起来的中华大地，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革。历史的辩证法，促使着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传统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崭新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

特别是在急剧变化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考古学的崛起和历史科学中所占地位的界定是学术界一大特色。考古学所以机逢盛运，一方面是由于阐明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需要考古学的阐明和解决，如人类起源问题，农业革命问题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另一方面，是高涨的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及文化事业的发展，要求提供更多的形象生动的实际证据以充实丰富民族文化内涵，而且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之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其三，国家的基本建设，特别是在重要历史文化区的建设(华夏文化区)，许多珍贵的地下文物宝藏，需要考古学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始能形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考古学便以古老而又年轻的新兴学科，跻身于现代社会科学行列，成为新中国历史科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建立起一个独立而独特的社会科学体系卓越立于文史领域，成为史学理论的阐发和弘扬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

考古学的历史使命，明确宣示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调查、发掘和研究物质文化遗存，以复原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特别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和记载简略的古代社会历史，以揭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在我国有如此悠久而深厚的(百万年以上)历史文化沉积，近一千万平方公里广阔的复杂的涵盖面积，要将这一部埋藏地下的宏伟而深厚的“地书”发掘整理出来，确实是任重而道远的。

由于我国有悠久的文化和文明历史和特具的人文科学内涵，很早就有研究古代文物的传统，即金石学传统。虽然金石学具有考古学研究的一些属性，但只限于文化类型品的个案研究，从整个社会机体来说，那只是一鳞半爪，离复原社会历史距离尚远。

在这样有限的工作和薄弱资料的基础上，要完成复原中国历史的面貌是很难的。所以在建国之初，站在时代前列并承担重任的历史文物与考古界的老前辈：郭沫若、郑振铎、尹达、王冶秋、梁思永、夏鼐和向达、斐文中诸先生以及文博考古界的一些前辈，审时度势，建立机构，培养干部，开展工作，提出建立体系的宏伟思构，并付诸施行。特别是尹达主持考古工作期间，特别重视考古学理论的研究和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建立。要完成复原中国古史的繁重任务，首先要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体系。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指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体现多民族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特色的和反映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物质文化体系。现代考古学，在中国是年轻而富于活力和潜力的学科，完备完善地建立起它的体系，才有望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考古界的同志，把建立考古学体系作为崇高的历史使命来完成的，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探索追求，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理论体系、方法论体系和文化发展体系三部分构架而成的中国考古学体系，同时大家也在继续不断地充实完善这个体系。

在这个体系结构中，氏族社会，即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研究，最为大家所注目，成果也最显著，解决的问题不少，提出的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更多。因此，不论在理论、实践或